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陈伯达组织“《红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	穆 欣
【书刊介绍】	《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	余大钟
【往事回首】	“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王庆顺
【拒绝遗忘】	荒唐岁月说荒唐	林 海
【文献资料】	批林整风汇报会日记	解学恭
【追根溯源】	彻底批判文革理论	车窗外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陈伯达组织“《红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

· 穆 欣 ·

陈伯达曾在所写《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中说：“‘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的）对我提出担任文革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周总理说：‘那你开个小组的名单。’”

陈伯达说这些话，似乎他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很乐意，是勉强接受的。实际上，他是抢着当的。1966年4月9日到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陈伯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彭真为首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拟发的《二月提纲》。这个会还没有开完，他就抢着“组阁”了。

4月12日下午，我在光明日报社刚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起来，顿即感到厌烦。为什么？因为连续多日，总受姚溱电话的骚扰。姚溱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和另一位副部长吴冷西一起代表中宣部分管北京各报的宣传报道工作。过去每次召集各报负责人开会，例由中宣部办公室通知，他们本人从未直接给报社打过电话，也从没有管过报纸的版面安排。但自《二月提纲》下达后成立彭真的五人小组特设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姚溱是这个办公室的一员）以后，姚溱突然直接关注我们报纸的版面安排，一再告诉我说：这次批判要“特别慎重”，要随时向他请示报告，要求把报纸涉及学术批判的文章清样和批判吴晗文章的版样送审。他还提出“注意质量”，限定有关学术批判的文章每周最多出两块版（我们这个报纸是以学术报道为重点的），而且指定每一块版上必须同时发表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章，“以利

于‘放’”。有几次送去的版样上没有“反面文章”（按：指支持吴晗的文章），他都退回来要求重新组版。

前文讲过，过去姚溱本人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这时他却每天都来电话，多时一天打过七次。这些电话常从报社办公室追到宿舍，不在宿舍就向家人追问到哪里去了，又把电话追到我所去的别处。看起来像有紧急的事，实际上还是“没事找事”，又是几句空话，无非是要监视我的行踪。如此反常，令人恼火。他为什么这样，至今不解。当时自己还不了解中央高层领导间的矛盾、斗争真相，我们报纸编辑部是“守规矩”的，编辑工作一直是按中央宣传部的安排办事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不放心？

因为以前曾有这些情况，这次以为又是姚溱的电话。接听后方知是红旗杂志总编室的电话，要我第二天到《红旗》编辑部开会，通知者只说会议是陈伯达召开的，没讲研究什么问题。那时还不知道中央书记处开会的事，过去自己与陈伯达从无来往，接电话后不免有点纳闷。

红旗杂志社在沙滩中央宣传部大楼上办公。13日上午来到《红旗》会议室的时候，陈伯达已先到了。他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加强对学术批判的领导，决定成立《红旗》杂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共计八人：陈伯达、尹达、王力、范若愚、关锋、戚本禹、穆欣、杜敬。这八个人除了我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外，其余都在《红旗》杂志工作。那天陈伯达兴致颇高，宣布了名单后，曾肉麻地拍着坐在身旁的尹达肩膀套近乎：“咱们两个‘达’终于在一起了。”

这天会上，就是陈伯达一个人讲话。他引经据典大谈学术批判问题，情绪相当激动，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他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苏联已从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回资产阶级专政。原来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什么都被打倒了。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起时落，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在这时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面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险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

陈伯达说：资产阶级钱很多，送给很多人钱，就跟过去了。很容易，请一顿饭就拉过去了。它用各种办法来进行腐蚀，把金箍咒套在你的脑袋上。所以主席说，阶级斗争还要搞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只要看封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了解。那时是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现在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性质完全不同。

又说，两个阶级、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是长期的。主席经常警告我们，搞不好要出修正主义。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

这个有名的“书呆子”，书是背得很熟，就是未能联系实际，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个“理论家”一辈子的悲剧就在这里。

接着，陈伯达就谈到《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事情，竭力攻击没有在场的原《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前一年已经被陈伯达排挤走了），讲到他在有关编辑工作以及理论问题上和邓作过的某些“斗争”。当时虽然不知道那些事情的真相，但看他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邓力群全面否定的武断态度，感到他这些话都很难以令人相信。乱七八糟地扯了一些事情后，他又激动而且非常夸张、无限上纲地说：“《红旗》杂志的专政也有无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同时还说什么“我同邓力群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问题”，让人听得发笑。他还激动地攻击田家英和中央宣传部一些同志，看来他已决心要“报仇”了。

陈伯达说，《红旗》应当加强学术批判，做到合乎中央对《红旗》的要求，“要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成为真正的红旗”。又说，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大家容易接受。《红旗》杂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做得还不够）。但是讲到批判国内修正主义，有些人就不行了。因为国际修正主义在十万八千里外，离得远远的；国内就不同了。为了加强《红旗》的学术批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关于学术批判问题，请大家到这里讨论。每周讨论一次，研究刊登什么文章，和《光明日报》互相支持。希望大家严肃地、开朗地，以无产阶级风格对待学术批判问题，互相提醒。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问题是不要犯严重错误，犯了错误就改。严格的科学态度，就是文章要反复地改。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改的就改。还说，我没有心思整人，但我不惯于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和平共处。对资产阶级意识要无情地批判，可以讥讽嘲笑。资产阶级意识如不狠狠地批判，它是不会倒的。

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就开过这一次会，只陈伯达一个人放了一阵空炮，没作任何具体安排，没做任何事情。所谓“每周讨论一次”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是开过的唯一的一次会议，是“成立会”，也是“散伙会”。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即批准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名单，4月26日到上海开会，5月16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前后均由陈伯达担任组长，风光一时。

陈伯达这个组长被江青架空以后，小组主要权力实际掌握在江青手里。但他仍然抓住那个“组长”的名分不放，江青一伙干下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得由他承担。

毛泽东素知陈伯达窝囊，曾说过“给陈伯达很多位子，他都没有掌住”，晓得他斗不过“刀子嘴，是非窝”的江青。陈伯达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上批评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了我不能割舍一个虚伪的名位。”又说：“我当时挂了这样的名义，没有解职，又没有辞职，不能制止这些事的发生，当然也有责任，谨听党和国家的裁决。”

□ 原载《世纪》2015年第2期

~~~~~

## 【书刊介绍】

《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

• 余大钟 •

7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春桥狱中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函装手迹版（函装手迹版附简体文字版，简体文字版单行本即将面世），首次披露有关张春桥的一手资料。

《家书》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神秘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丝丝缕缕，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数次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披露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得以走进这位被刻板化乃至“妖魔化”的历史人物，看到作为父亲、丈夫、长辈、囚犯、病人、毛泽东的晚年知音和追随者、马列主义者等多种面貌的张春桥，也为理解文革和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角。

#### ◇ 《家书》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样评价：“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张春桥是文革时期党内左翼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他的狱中家书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也为理解中国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命运提供了思想线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感叹：“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中国当代史家卜伟华等均有中肯评论。

《家书》由书籍装帧设计家何浩设计。函装手迹版以全彩印呈现书信原貌，文字版则以印刷字体排版，附访谈及注释。整体书籍的设计制作精良而节制，体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中正态度，也反应出版社在电子书时代对实体书持久存在价值的理解。何浩在设计手记中说：“文字版偏重信息阅读……而手迹版则偏重对文献实物的体味，用纸张、字迹把读者带入真实的、可触摸的情境中……这部书的封面字体和色彩借用了正统毛主义出版物的范式，严肃、坚定、刻板，如同张春桥身上的那套似乎永远不变的灰色中山装，可以瞬间把人带入他的那个时代。但同时这部书的设计又绝非复刻，……实际上也同时将这部书的形态彻底转换到了当下语境中。”

#### ◇ 《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

1977年张春桥被押往秦城监狱，1985年开始可以被允许和家人通信。本书收录的58封信中，写给长女维维的信最多，其他则寄给另两位女儿和儿子毛弟、妻子文静，以及两位孙辈。在这些书信中，张和子女谈往事、谈时事、谈社会现象、谈自己的读书感想，坦诚而冷静。

张春桥是个文人，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鼓励孙辈多看书、多学习，为社会做贡献。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

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1999年4月24日）

张在狱中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对时事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均给予坦率的评论。对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张极不认同，他在1990年7月27日给维维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

对苏联解体，张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他说，“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1992年1月21日信）他注意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颇有幸灾乐祸之意，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1998年9月20日）

#### ◇ 张春桥的性格和家庭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长期以来，张春桥在海内外文革研究中被屡屡提及，但无一不是刻板扁平的政治人物形象，或者被刻画成阴险狡诈的小丑，而在家书和专访中，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性和他与家人的情感得以复活。

谈到自己的性格，张春桥在1989年12月16日的信中说，“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作为一位毛路线的终身信仰者和践行者，张春桥有着超强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甚至在权力的巅峰时刻也可以冷静地预知自己悲剧的政治宿命。维维在采访中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四人帮”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书中的阐释让读者了解到张性格中的理性、冷静和倔强。维维在采访中指出，张春桥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高度认同并始终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而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面对这种情况，张可说是无言以对。

张和妻子文静因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走到一起，情感稳固。1998年张春桥获保外就医资格，在江苏江阴监视居住，文静主动要求去江阴照顾张的生活起居。对于两人曾经的离婚波折，维维的采访也给出了正面回应。从书信中可看出，张和长女维维的关系尤为亲密，时时关心女儿的身体和情绪。在1985年1月25日的信中，张对女儿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他多次叮嘱家人不要为自己破费，安慰子女情绪，甚至细心指导孙辈写作文。1999年初春节期间，张在江阴监居

地见到了四位子女及其家人，显得尤其兴奋“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1999年2月27日信）这些细节体现了作为父亲、丈夫、外公的张春桥细致的情感。

#### ◇ 张毛关系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张维维

张维维在采访中说到父亲病危时做的一个梦，反映了毛、邓、周、张等多位领导人的微妙关系。“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张因何得到毛的赏识而成为文革的重要领导人？张在给女儿的信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1966年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与毛共度生日等。书中反映毛多次与张个别谈话，了解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跟张讲述党内历史的诸多细节问题。

张春桥一生的理想是做毛的秘书、助手，“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晚年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毛的崇敬并未因其所遭受的政治挫折而受到丝毫影响，甚至可说是更为坚定。在其事业的顶峰，张春桥送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礼物是一套《毛泽东选集》，上面的题辞是：“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狱中，他仍然写信给女儿说“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鼓励子女多读毛的书、以毛的精神激发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节录：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写给长女维维的信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原载《共识网》

~~~~~

【往事回首】

“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 王庆顺 •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工作期间，结识了线材分厂的司磅员薛德元。也算是造化弄人吧，此时此刻穿一身蓝布工作服的老工人薛德元在“文革”时期可是南京“八二七”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在造反派推举下，在1968年至1976年期间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我通过与薛德元的多次交谈，兼之查阅了大量有关“文革”的资料

（官方资料和当年造反派小报），大致了解到1967年发生在古城南京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和“一·二六”夺权的来龙去脉。

1967年1月3日夜，位于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起事件是“文革”以来江苏发生的首起大规模武斗事件，人称“一三事件”。“一三事件”发生后很快就震惊全国并惊动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是由武斗双方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引起的。冲突的挑战方是由“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和“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等造反派，而被迫卷入冲突的一方是“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简称“赤卫队”）。当时红总和工总提出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一切旧制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当时红总和工总闹腾最凶的下属组织有“南大八二七”、“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五中八八”、“六中韶山公社”、“跃钢八一八”、“南机井冈山”等。这些造反派四处鼓吹“停课、停产闹革命”，到处搞打、砸、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赤卫队虽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但该组织是由党团员、劳模、先进生产者、敬业老工人组成的，他们反对打、砸、抢，反对“停课停产闹革命”。笔者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据我所知，当年（1966年11月27日）赤卫队成立后，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该组织在短短的个把月内，就发展到近30万人。

由于红总和工总的各下属造反派组织成立在前，而赤卫队成立在后，两派的政治立场、诉求（当时称“观点”）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所以，造反派便认为，赤卫队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保皇派”。造反派还无中生有地到处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说赤卫队是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暗中策划成立的，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死保“旧省委”和“旧市委”，与“砸烂旧省委、旧市委”为奋斗目标的造反派唱对台戏。造反派还给赤卫队贴了个“叛徒组织”的政治标签。

赤卫队成立之初还能与红总和工总分庭抗礼，甚至还比红总和工总的“人气”要旺一些，但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帮助听命于自己的江苏省各造反派，在公开场合表态，说赤卫队是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对赤卫队的活动不予支持。与此同时，上海的造反派“工总司”头目王洪文也到南京，向南大造反派“传经送宝”。就这样，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在外地造反派的声援下，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好斗。从此，红总和工总便与赤卫队势不两立，且不断制造谣言，栽赃陷害赤卫队，并不断向步步退让的赤卫队展开攻势，挑起事端。

为了彻底打垮赤卫队，红总和工总于1966年12月上旬组织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到首都去“揭发、控诉”“旧江苏省委”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卖力执行“迫害造反派”支持“赤卫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见造反派“恶人先告状”，赤卫队领导层决定先向江苏省委请愿，再见机行事。12月中旬，数千名赤卫队员有组织地来到江苏省委大院，要求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他们，同赤卫队签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江苏省委已关注到中央文革小组对赤卫队的表态，所以省委无法满足赤卫队的政治诉求。两三天后，聚集在省委大院及其附近的赤卫队员已达数万人。赤卫队领导层此时也注意到省委有难言之隐的苦衷，觉得这种政治诉求在省内是无法解决了，便决定进京“请愿”。

1966年12月25日下午，数千名赤卫队骨干队员在浦口火车站集合，临时成立了“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赴京汇报代表团”。由于这数千名赤卫队员临时“加塞”，使当年因

红卫兵大串连造成的超负荷铁路运输更是雪上加霜。几列北上的列车因严重超员而停开，津浦线一度中断。这数千名赤卫队员在情急之下，脑子一热，决定步行进京。

江苏省委获悉数千名赤卫队员徒步赴京“汇报请愿”的消息后，觉得此举欠妥，便派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于25日晚驱车急赴浦口火车站，劝说他们回城解决问题。经过一夜苦口婆心的劝说，只有少部分人愿随王楚滨回城就地解决问题，大部分人仍决定徒步进京。王楚滨被逼无奈，只得随同赤卫队员一同北上，沿途劝说他们。经过一天急行军，26日晚王楚滨随同赤卫队员来到安徽省滁县。这时，陆陆续续涌进滁县的赤卫队员已达万余人。当年的滁县规模很小，一下子涌进这万把人的“不速之客”，完全没有能力接纳。当时正值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隆冬，广大赤卫队员不但无屋可御寒，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处境非常恶劣。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从王楚滨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这种情况，他怕冻出人命，忙向南京军区求援，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杜平当即指示军区后勤部办理此事。后勤部紧急抽调了20多辆汽车，将5000余床军用棉被和部分军大衣送往滁县，时为29日。与此同时，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又派出一批政工干部和各工矿企的领导干部赶赴滁县，配合王楚滨“游说”广大赤卫队员。经过多次推心置腹地劝说，这万余名赤卫队员在赤卫队高层领导指示下，于1966年12月31日开始返回南京，这次“撤军行动”至1967年1月2日结束。

返回南京的赤卫队员回城后大多数都返回原工作单位或回家“待命”，但也有部分情绪激动的赤卫队员不愿回厂回家，而住进了江苏饭店，他们声称，他们要为赤卫队是否是革命群众组织讨个说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些住进江苏饭店的赤卫队员有2000多人，其中有百余名女赤卫队员。

江苏饭店是省政府的招待所，2000余名赤卫队员入住江苏饭店的消息传开后，造反派认为这里面有名堂。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连会”勤务组（总部）总负责人曾邦元从中窥伺可乘之机，他紧急约见“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全国革命造反串连会”等造反派驻宁联络站的头目。曾邦元与其密谋后，对外谎称，说是全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头目正在江苏饭店开黑会，准备抄红总和工总的总部，现在正有一批批手执武器的赤卫队员在江北集结待命。曾邦元还说，南京各造反派组织已达成共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赤卫队胆敢先动手，造反派必将予以强有力的“自卫反击”。由此可见，此时曾邦元和其他造反派头目已为即将发生的“先发制人”的武斗开始大造舆论。为了“战则必胜”，造反派还派人事先潜入江苏饭店，刺探“敌情”。

1月3日晚10时许，突然，在江苏饭店周边的大街小巷响起一阵令人心悸的哨子声，一拨拨埋伏在此的造反派手执红缨枪、齐眉棍、大砍刀潮水般地涌出，将江苏饭店包围得水泄不通。

正在江苏省委值班的省委副书记陈光得知此事后，忙向第一书记江渭清汇报了这紧急情况。他俩在和其他省委领导紧急磋商后，一致认为：必须设法制止这场即将发生的武斗。省委立即调动近400名民警奔赴现场，组成人墙，试图将冲突双方隔离开来。与此同时，省委还急派陈光、李士英、岳维藩、洪沛霖、宋超等领导同志赶赴现场，分头做冲突双方的思想工作。谁知，志在必得的造反派头目根本就不买省委的账，他们在扣留前来劝说的李士英和岳维藩后，随即下达了向客居江苏饭店的2000多名男女赤卫队员发起攻击的命令。毫无武斗准备的赤卫队员被迫拿起凳子、拖把等生活、清洁用具进行抵抗。“战果”可想而知，2000多名赤卫队员被数倍于自己的手执器械的造反派打败。在这场冲突中，赤卫队员有三分之一人员受不同程度的伤害。这起武斗事件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

“一三事件”发生后，赤卫队与红总和工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双方都上街示威游行，控诉声讨对方，新的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一三事件”发生后，南京广大市民都处在观望状态，他们企盼了解“一三事件”的真相及冲突双方的对与错。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来电话，陈伯达在电话中措辞严厉地指责南京赤卫队在江苏饭店制造白色恐怖，责令江苏省委不得对此袖手旁观，更不能幕后操纵，否则后果自负！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南京赤卫队很快就垮了。不久，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江苏的造反派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江苏省委的权，人称“一·二六夺权”。由于夺权前后造反派内部矛盾加剧，有些造反派组织未被邀请参加夺权，夺权后又因权益分配不均，造反派彻底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拥护“一·二六夺权”的这派由红总和新工总组成，他们高喊：“一·二六夺权”就是好！人称“好派”；另一派由老工总、东方红、八二七组成，人称“老东八”，他们强烈反对“一·二六夺权”，高喊：“一·二六”夺权就是好个屁！人称“屁派”。

□ 原载《钟山风雨》2015年第3期

~~~~~

# 【拒绝遗忘】

荒唐岁月说荒唐

• 林 海 •

◇ 我怎样被打成了“蒯派”？

1966年6月4日，刘涛和几个同学贴出了质问蒋南翔的大字报“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次日，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女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蒋南翔和清华党委。6月9日，叶林、周赤萍带领工作组悄悄进入清华园。第二天，就出现了对学校干部和学生辅导员进行殴打、侮辱和戴高帽子的现象。

我对发生在面前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怪事无法理解。蒋南翔是校长，怎么能反对呢？清华党委是党的领导，又怎么能反对呢？学校动员大家参加文化革命，写大字报。我想，我总不能站在反党右派一边吧？于是，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对‘反对蒋校长’！！！！！！”，下面寥寥数语，签了名，贴在宿舍门口对面的马路边。

6月13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正式亮相，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接下来又成立了“临革筹”，高干子女成了各级“临革筹”的委员。学校一级是刘涛、贺鹏飞，分封到无线电系的是王新民，无9年级是王苏民，无902班是荆南飞。几个高干子女拿着照相机给我的大字报照了相，我知道麻烦来了。

麻烦果然来了。我惴惴不安地过了几天，一天吃完晚饭回到宿舍，趁着左右无人，蔡法悄悄地给我通风报了信。蔡法说明天就要批判我，问题就是那张大字报，说是反工作组的。我神色索然，心里在盘算要做什么。

首先我想到要赶紧通知田宁宁。田住在代表队，在这个当口我不能去找她。我写了个纸条：“划清界线”，托一个女同学给她送去。接着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我一个初中同学

赵淑雯，一封给我广东老家亲戚。信内容很简单，语气决绝，告诉他们出事了，不要再跟我联系了。蔡法帮我发信去了，我坐下来想如何应对明天的批判会。

批判会气氛相当热烈，我的同学好友一个个都踊跃发言。蔡法也被列入受批判对象，没有发言权。田宁宁神色有些不对头，我很担心纸条送到了没有？正在胡思乱想之际，耳边传来田宁宁的恰恰莺声，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的“罪行”归结起来有几条：

- 1、我在大字报上划了7 个感叹号（！！！！！！），意思是“恶毒攻击工作组是‘忘八’！”
- 2、“小杂家”，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徒子徒孙”（琴棋书画）
- 3、“修正主义苗子”（这话从何说起？）
- 4、“右派教授的得意门生”（常迥先生作过辅导）
- 5、“舅舅在香港”（档案）

6月16日，蒯大富贴出“工作组往何处去？”的大字报，成为反对工作组的风云人物，工作组于是把一切不顺眼的人统统都划为“蒯派”。

6月19日王光美到清华任工作组顾问，把“桃园经验”的整人经带到清华。刘少奇说：“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刘少奇的话今天听起来仍然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在清华挨整的“蒯派”保守估计也有五、六百人。文革中如果刘少奇胜出的话，这些“蒯派”恐怕早就成为“鱼鳖”了。

一天，荆南飞押着我去参加批斗蒯大富的大会。会上，学校合唱队的一个男同学发言。我说：“他嗓子真好。唱歌好听，说话也好听。”回来后，荆南飞向工作组汇报说我说了发言的同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成了我的一条新“罪状”。

接着，工作组搜查了我的私人用品，抄走了我的17 本日记。这些日记是我从中学以来的忠实记录。我有哪些不足，有什么错误，甚至连我对哪个女生有好感，都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工作组如获至宝，组织人力从中搜集炮弹，准备要置我于死地。

后来，在东主楼的阶梯教室召开了全年级大会对我进行批斗。阶梯教室呈半圆形，后面一层比一层高。我在讲台位置，成了会场的焦点。几百双眼睛盯着你，几百张红口毗着白牙吼着你，这种架势我还真没有遇见过。我有一种被人扒光了裤子放在火上烘烤的感觉。

8月4日晚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了清华，召开大会，宣布受迫害的“蒯派”解放了。工作组的爪牙在我的身后发狠，等着“秋后算账”。我想这几个蚂蚱的秋天也快来了。

#### ◇ 我所亲历的“清查516”

我从农场出来之后，分配到了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电管站工作。单位不大，只有十几个人，基本上都住在单位里。车间和办公室南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西边一排三间房，每

一间大概有12平方米。我住在南边的房子里，一门一窗。窗户下面放了一个痰盂，是我买来准备当作花盆种花用的。住在中间的是王师傅。王师傅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写得一手好字，待人也很有实诚。北边住的是李献彩一家。李献彩家有一个老人，三个孩子，再加上他们两口子6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两口子经常吵架，孩子们也时不时在院子里拿别家的劈柴青菜等东西，所以我没有到他家里去过。

老站长调走之后，电管站来了一个新站长，叫做李沛田。李沛田家也是6口人，住在办公室后院的一排房子里，有两个大间，门前还有一个小厨房。过了没几天，李沛田叫来工程队，把小厨房拆了，翻盖成一间又能住人又能做饭的较大的房子。

每天上班之后都要先开会政治学习，“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沛田动员大家发言，说了一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套话。“引蛇出洞”的“阳谋”咱也是知道的，没怎么太当回事儿。

我说：“李站长，我给你提点儿意见。你的住房已经不错了，还用公家的钱翻盖厨房。李献彩一家也是6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你也该关心关心职工生活困难。”

李沛田的脸“夸”地一下掉了下来，沉吟半天没开腔。最后说：“啊……好好好……提意见，提意见……散会，散会！”

不久，“清查516”运动开始了。一觉醒来，发现院子里贴上了大标语：“把516反革命分子林海揪出来！”我肚子里感到好笑。

开会了，我站在中间。看平日要好的同事，有的低着头，有的把脸别到一边，也有的开始振振有词地“批判”。李献彩跳得最高，扯着嗓子喊“打倒516反革命分子林海！”气氛渐渐高涨起来，大家也跟着喊口号。

李沛田露出凶光，要我交待“516罪行”。政治运动整人的那一套，无非就是先扣上大帽子，再整你的材料，然后逼迫你交代认罪。有几个同事念批判稿，抄了一通报纸社论，我听着没什么劲儿，就站着开始练气功。倒是有一个叫做刘兆奇的同事，说我“死不交待”是“背着牛头不认脏”，我觉得说得有点儿意思。刘兆奇是唐山人，我在捉摸他说的是唐山话还是武都话。小时候我在唐山住过，好像没有这么骂人的。

说我是“516反革命分子”，唯一的根据是我是清华的，从北京来的，有枣没枣三杆子。我想到我的同学好友，而今是天南海北，此时此刻可能都在挨整呢。正在我浮想联翩之际，一个叫做高启荣的青年工人终于抛出了“重磅炸弹”。

高启荣“揭发”我在办公室一张旧报纸上写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字。我想起确有其事。几天前，我借了王师傅的笔墨，在办公室里找了些旧报纸练大字。没有字帖，信手乱写。我记得写过“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还写过“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等词句。这也成了“516罪行”？

高启荣叫道：“林海！你要拿你的血荐什么人？你是赤裸裸的阶级仇恨！这是阴谋反革命复辟！”会场一下子炸了锅。同事们面面相觑，害怕了起来。刘兆奇领着大家高喊“打倒516反革命分子林海！”的口号，李沛田微微矜笑，得意斩我于马下。

念完“批判稿”，高启荣和李献彩上来，要给我来个“喷气式”。我大喝一声：“高启荣！你好大胆！”这两个人一下都愣住了，会场的气氛也马上凝固。我决定无耻地展开反击。

我指着高启荣的鼻子说：“你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是谁的诗？我告诉你，这是鲁迅的诗！你污蔑攻击鲁迅，你就是反对毛主席！”可怜高启荣吓得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往后退。我逼近一步，喝道：“把发言稿留下！这是你现行反革命的罪证！”

会场形势急转直下。李沛田急忙宣布散会，叫李献彩等几个人把我押回我的宿舍。到了我的房间，这伙人把我切菜的刀和劈柴的斧子都搜走了。我坐了下来，想到一个人在这个无耻的世界上，要怎么无耻地活下去。

接着，他们用大字报把我的窗户糊了个严实。我看不见窗户外面，他们也看不见窗户里面。过了些天，我发现糊窗户的大字报抠了个小洞，大概是想监视我吧。我透过小洞往外看，正看见李献彩的小儿子手里拿着一块石头蹒跚地走了过来。这小家伙走到我的窗户台下，“哐当”一声把我准备种花的痰盂砸成两半儿。

我打开门，骂了声“小兔崽子！”小家伙一边跑一边回头，眨着坏坏的小眼睛。我关了门，想起鲁迅写的，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片苇叶，嘴里喊着“杀！”我感到很悲哀。

后来武都地区搞载波，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解决不了。带队的地区宣传部的钱荣贵，通过地委把我放了出来。我坐车到了康县，几个技术人员说载波功率发送不出去，他们搞了好多天了，有人都病倒了。我测量了一下发射管的工作状态，把帘栅压从180伏调到240伏，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钱荣贵是江苏人，说：“什么516？都是老球蛋！”我在钱荣贵的手下，跑过康县、成县、岷县和宕昌县，虽然辛苦，倒也快乐。后来李沛田调走了，钱荣贵做了站长，老钱待我还真不错。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离开武都，全站同事都来送行。李献彩跟我道了歉，说：“老林你别嫉恨我，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房子的事情你为我说了话，我没有办法！”我握着他的手说：“没啥！”隔年，我从北京回到甘肃看望当年的同事，往事已成笑谈。去年我又见着了老钱。老钱老多了，他说刘兆奇成了他的儿女亲家。只是“老球蛋”的口头禅依然故我。

作者简介：林海，男，1944年6月12日生，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无902班。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文献资料】

批林整风汇报会日记

• 解学恭 •

〔王辉按：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以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北京军区。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揭发陈伯达的报告上批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军区党委开会专门讨论，他把这称为“甩石头”。接着，毛泽东又采取“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改组北京军区领导。

同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参加华北会议的有449位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次会议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及北京、天津、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解学恭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常委、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北组副组长，与李雪峰、吴德一起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并曾经随同陈伯达到华北各地视察。为此，解学恭在华北会议上做了多次检讨。1971年2月3日，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天津警备区党委联合召开500余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为时两周，解学恭在会上再次反复检讨，接受与会人员批评。最后，还是周恩来让纪登奎打来电话指示说，中央对解学恭的问题已有结论，不再追究。

解学恭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经历，从中不难看出批陈整风期间，政治风云变幻，形势发展神秘莫测。解学恭的日记还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处理林彪叛逃问题的过程，记录了天津市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重要事件。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一三”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要矛头成为批判、揭露、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并且定性为中共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1972年5月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6日，经毛泽东批准，将《通知》下发，其中提到：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斗争。

5月21日至6月23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党政等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

在5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会议印发的文件逐一做出说明、解释，回顾了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并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24日至26日，周恩来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各小组召集人会议、东北组讨论。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次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5月29日至6月7日，周恩来起草了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7日将所写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言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写出初稿”。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

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用三个晚上做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

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做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

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上，周恩来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从林彪出逃之后，中央只是连续发了一些文件，毛泽东并没有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最后只由总理主持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了结。显然林彪出逃是对毛泽东的致命打击。

现仅将解学恭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的日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解学恭日记（1972年5月21日—1972年6月24日）

五月二十一日

上午，阅读中央发的批林整风文件“会议文件之二”（1、2、3）

王良恩〔注1〕同志召集秘书开会，传达如下问题：

一、会议文件发五个：

文件之一，批林陈以来毛主席的批示。

之二，部分中央文件汇编。

之三，“材料之三”。

之四，对陈伯达审查报告及罪证。

之五……

二、参阅文件五个。

三、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晚八时到十一时开会，大小会场均在人大会堂。

四、注意事项：

1.安全保卫：政治局决定与会人员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带武器。

2.注意保密，守纪律，保证不遗失文件。

3.工作问题可向家里打电话，但要尽量少，不要涉及会议内容。

下午，继续阅读文件。

晚九时至十时，全体会议。

总理讲话：

这次会议叫批林整风会议。共到会312人，比去年批陈整风99人扩大了。

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一三”，打击矛头是陈伯达，叫批陈整风；斗争深入，证明林彪是九届二中全会反党夺权的总指挥。刘少奇之后，挂帅的搞阴谋篡权的就是林彪。因此，斗争矛头要对准林彪，叫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的两个阶段，贯穿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红线。因此，对主席的指示，系统地学习，掌握斗争武器，深入批林斗争。

这次路线斗争是最尖锐、最复杂的。1966年7月8日，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讲的非常深刻，预见到有人搞阴谋。当然那时还不能讲是谁。

参加会议的人，报告了主席，主席说，梁兴初〔注2〕、谢家祥〔注3〕能到会，难道张西挺、刘结挺〔注4〕不能到会吗？

根据主席指示，其他地方也应考虑一下有没有对立面的人可以参加会。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集中精力打击林彪一伙，团结大多数，团结更多的同志。先读文件，三天，明日开始。

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起，到“九·一三”林彪叛党叛国以前，一直是批陈整风，保林过关。“九·一三”事件以来，真相揭穿了，反党的总头子是林彪，陈伯达只是帮凶之一，所以现在提林彪反党集团，不再提林陈反党集团了。

这次会议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是批判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一批干部，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月二十二日

上午、下午、晚上都阅读文件。

五月二十三日

上午、下午阅读文件。

晚：六位召集人碰头，研究这两天来学习情况和提出的意见。登奎同志参加。大家希望：

一、中央负责同志给讲解一下“毛主席致江青同志信”的背景、意义以及读不懂的典故。

二、批判、揭发，情况汇报，个人检讨，三者是综合进行，还是分阶段，心中没底。

五月二十四日

上下午继续读文件。

晚八时至十时，政治局召集各组召集人开会，王良恩同志讲了这两天学习情况及各组提出的意见，接着进行了讨论，共六个问题。

一、是否延长一两天读文件的时间？

二、要求把“五大将”（注5）去年的检讨给每人一本作为反面教材，以便对照。

三、发言是分阶段、还是结合进行。

四、要求解释毛主席致江青同志信的问题。

五、关于要求印发“五大将”的交代材料问题。

六、到毛家湾（注6）参观问题。

把政治局的指示当晚向吴岱、刘政、蔡（注7）传达了。

五月二十五日

上午，继续读文件，下午参观。晚八时至十一时，华北小组会议，讨论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读文件。

下午：召集人集体审改华北组简报。晚：七时至十时，华北小组继续开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有提纲）。

五月二十七日

上午：小小组集体学习，边读边议。主要学习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其中有几段可以很好地帮助理解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关于个人崇拜问题；集中力量打倒刘少奇一伙走资派等。

下午：个人作准备发言。我参加召集人集体修改简报的会议。

晚七时至十时，继续讨论信。蔡树梅同志发言，讲得不错。

五月二十八日

上午：集体学习，边读边议。主要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批示、文章、谈话纪要。

刘政同志请假外出。

下午：参加召集人集体审定简报。

主席同意会议先务虚，这样好。个人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完全不联系实际就空了。因此可以联系本地情况，或个人检讨，或有争论的问题，但不要长篇大论。已经检讨了的，检讨好的，行动上改正的，不要再大讲了。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愿分裂的；有斗争性；有进取性不甘落后。

晚七时至八时，政治局召集各组召集人开会。总理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开好这个会的指示。总理、江青同志并讲了话。

一、先务虚。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这两天仍读文章、讨论，联系批林5·18讲话、庐山讲话。

联系自己的认识、实践，讲讲当时为什么那样认识，把自己放进去，当然不要讲多了。

二、希望青年同志多发一些言。他们没有什么负担，敢讲，就是说错一两句，不要紧。老同志的拘束对他们有影响。

三、总理准备给大家讲讲十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四、这次会议是第二次延安整风，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应当心情舒畅，讨论、研究，达到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五、66年有一股风，说“兵变”，掩盖他们什么阴谋。

六、召集人中应当有一位女同志。

八时至十时，小组传达政治局指示后，继续发言。

五月二十九日

上午：小小组继续边读边议。

下午：召集人集体审定简报。

晚：大小组继续讨论。至此已有十几位同志发了言，还有八位同志报了名。

五月三十日

上午，小小组集体读议文件，

下午，集体审阅简报稿。

晚，七时至十时，华北小组继续开会讨论。

五月三十一日

上午：小小组集体读议文件。联系到天津几件事，大家同意在发言时讲讲：

1、1970年5月党代会代表到孟家楼〔注8〕参观问题；
2、批准林程〔注9〕为河东区委员问题。
3、在天津选妃子、招驸马问题。
4、林立果的“报告”传到天津问题。
5、黄专于1970年4月到天津仍散布战备为纲的问题。吴私到二师，464医院。〔注10〕

六月一日

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休息、不外出。下午在会址看电影“海港”，晚“龙江颂”。

六月二日

小小组没有开会，个人读文件作准备。

下午，小组开会边读边议，我参加修定简报。

五时半，先念、登奎同志召集会，研究天津缺水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秋里、张文碧、钱正英、吴德、刘子厚、解学恭等。

首先传阅了总理在天津水情严重的报告上有批示。大意是请先念、登奎、国锋、吴德、子厚、学恭一议。看解决天津缺水有什么办法，并联系到河北、北京一带解决水的问题。

会议讨论后议定：

一、先放北大港水。

二、潮河水库水作为大港水的继续水源，以保证工业、民用。

三、立即停止农业用水。

四、部队农场立即停止用水。

五、打井要抓紧。自力更生解决天津用水。有困难国家帮助解决。

二日晚十一时，将会议定的问题已电话告王、许、费三同志〔注11〕。

华北组继续开会，刘政同志揭发了一些问题，吴岱同志发言，检查了一些错误。

六月三日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汇报情况，自我检讨。

上午作汇报及准备自我检讨。

又通知，仍照前些天一样开会。

下午：集体搞简报。

晚，七时至十时开小组会。郑三生〔注12〕、纪登奎同志发了言。纪的讲话内容丰富，联系实际剥了林彪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

六月四日

上午：继续学文件。

下午：看简报。再读江青同志在西南组会上的讲话。

晚：小组未开会，个人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在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六月五日

上午参观邱会作的黑窝子。全家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化糜烂生活，连14岁的小孩儿也不例外，真是惊人。

下午：读江青同志第二次讲话。

晚，华北小组继续开会，我在会上作了检讨。

六月六日

上午阅读文件，下午审修简报。

晚，华北组会议，批判林彪1940年7月反动文章〔注13〕。

六月七日

上午：阅读文件，边读边议。

下午：修审简报，

晚：小组继续开会，批判林贼反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的罪行。

批判林贼“短促突击”一文。

六月八日

上午：小小组讨论林贼在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放的毒。

下午：修审简报。

晚，华北组继续开会。

江青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大治”。大乱中有治。乱是双方的，主要是乱了敌人，敌人也趁机乱我们。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今天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在这里开会，对林贼进行批判，并要批深批透，这就要有思想武器，武器到“老祖宗”那里去找。然后回去，省地县、军区、分区，直到群众中去批判；路线觉悟提高了，工业、农业及其他工作就上去了。

乱和治是相对的。一定时间乱为主，一定时间治为主，但是治是相对的，乱是绝对的。大治中还会有小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战一直没停下来，大战是大乱，大乱中也有治。大战之后治中有乱。乱和治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统一。

受冲击要具体分析，有的同志受了冲击，有缺点错误受了冲击；有的是冲击了敌人。群众是中央发动的，毛主席发动的，革命的乱，乱出敌人是大好事。林贼利用革命的乱，趁机搅乱，混水摸鱼。

六月九日

上午：小小组讨论江青同志讲话，阅读了十六条，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

下午：修审简报。

晚，小组未开会。个人阅读“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未定稿）”。

六月十日

上午：参观李作鹏的黑窝子。全家过着极为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生活，同邱会作同出一辙，都是林贼的那一套。

下午：阅读简报。

晚八时至十二时，全体会议。总理讲话，以亲身体会讲十次两条路线斗争。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理论与实践，阐述得很深刻。今天只讲到“六大”。

六月十一日

上午：阅读陈独秀等 81 人反党“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注 14）这是一本托洛斯基论中国革命的大成，反动透顶。

下午：阅读空军五人联合检查发言（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薛）。

看了之后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讲出似的。

晚：七时至十一时，全体会议。

总理继续讲十次路线斗争，讲至遵义会议。待续。

六月十二日

上午：读简报。

下午：阅读文件。

晚七时半至十一时，总理继续做两条路线斗争报告，（三个晚上讲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六次路线斗争）。

六月十三日

上午，小小组讨论总理讲话。

下午：小组（小）继续讨论总理报告。

晚：七时至十时，大小组讨论总理报告。

一、总理报告以亲身经历和大量事实，联系自己的错误讲了两条路线，对自己教育很大，感受甚深。发扬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起了带头作用，给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给了示范。

二、更深刻地理解了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的伟大真理。

三、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改造不好，必然犯错误。认真读马列毛主席的书是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四、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要经常一分为二，想想缺点、弱点、错误。

六月十四日

上午：小小组继续讨论。

下午：小小组继续讨论，并准备发言。我参加审查修改简报。

晚：华北组开会，继续讨论。围绕着对总理报告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一般都是表态谈体会，最后提了十几个问题，希望再给讲讲，都是属于历史背景，斗争史实等方面的。

六月十五日

上午：会议秘书组通知三点：

1. 今日上午，各小组继续对总理报告提修改补充意见。

2. 下午晚上，看会议文件之三、之四（林陈罪证材料）和会议文件之一。

3. 十六、十七、十八三日，各组开会，对林彪反党罪行继续进行批判。

上午参加修改昨日简报。

下午参加李德生、汪东兴同志召集的会议，讨论来信、来访问题。

总理批示：兹事体大，务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切实一商，务求符合政策，件件落实，在六月下旬使情况开始好转（大意）。

晚七时动身回津，九时半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落实总理指示。一是在落实政策方面，进一步抓紧，成批解决问题，减少上访人员，如遣返，干部，下乡落户人员的政策。二是可以配合北京同时进行清理流动人员工作。三是加强对专政对象的管理和监督。

十一时半至下午一时，同许诚、国柱、曼恬同志谈了谈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并谈了天津警备区把一个全民所有制工厂改为部队所有制；利润自己分配，不上交国家；利用职权挪用电讯局资金用于小团体；私自招收工人等违犯原则和政策的严重错误，并建议警备区常委开会，无偿退还工厂。许诚同志同样这样看法，并表示要坚决处理。同费、王谈了，市里要普遍检查一下，有这类问题的单位要主动改正。

六月十六日

上午九时许动身返京。十一时半到达京西宾馆。

下午：阅读文件。并将处理警备区侵占工厂问题向先瑞同志（注15）写了个信。

晚：七时至十时，华北组开会，对林贼进行批判。会议上议论了林贼破坏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问题。

晚十一时至下二时，登奎同志约吴岱、我和刘政同志谈警备区和六十六军是否有不团结问题。刘政同志比较敞开地讲了问题的本质。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朱彪同志（注16）的两面派行为造成的影响；二是警备区内部矛盾表现有时以外为主、有时以内为主；三是批陈整风时，王一同志的非组织活动情况，王几次拉刘，打倒解，刘不同意，王发展到背后搞名堂的地步，这是引起关系紧张的原因。

六月十七日

上午：读文件。

给许诚同志并党委写了一封信，督促他们尽快开会，处理把全民所有制工厂改为部队所有制问题。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这个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小团体侵占全民所有制，不管动机如何，从实质上看是个原则问题。许诚同志处理这一问题可能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孤立。这封信想阐明我的观点和立场，支持许诚同志处理这一问题。

下午：集体审查修改简报。

晚：华北组继续开会，讨论对陈伯达的审查报告，并提了补充材料意见。

毛主席对陈伯达做过多次批评，很尖锐，但这个老反共份子死难悔改。1942年他准备担任毛主席秘书时，他就不敢担任，并且要请示张闻天后才定，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是“脚踏两只船”。

1950年毛主席到莫斯科谈判时，陈是随员。当谈判遇到一些困难时，陈伯达就私通外国避到驻苏修使馆。毛主席批陈说“老鼠搬家”。

1969年，批评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是一篇修正主义作品时，陈不服。毛主席批评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修正主义本性不会改，陈伯达本性也不会改，我们马列主义本性也不会改。又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现在就报仇了！

六月十八日

全天休息。上午，同吴一道到前门饭店看张波等同志，并研究天津生产小车的计划，规划为五千辆；造型要朴素大方，经济耐用；要注意采取新工艺、新技术；造型、试制，工艺要搞好，然后再批量生产，免得长期处于不断修改的局面中，要快反而慢了。

晚上看上海舞剧团“白毛女”。

六月十九日

上午看文件、简报。

（刘政同志从十七日晚请假到今日上午八时半返宾馆）

十时，陈先瑞同志传达。王良恩同志召集各大组召集人传达了毛主席、政治局对会议的安排问题。

政治局同志到主席那里汇报了会议情况，会议再开五天就可结束了，据此安排：

一、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天，看参阅文件之一（林彪军事方面罪行），讨论重点，以星火燎原、遵义会议以后，辽沈战役前后（锦州为重点），主席指示，林彪的对抗。方法，边读边议，晚上开大会。

其他两天别安排。也可能是四天，还要个别地解决省市的一些重点问题。

后四次路线斗争不讲了，会议最后总理讲一讲就结束。

二、准备的汇报材料、揭发材料、个人检查，可以采取书面上送的方法。（新的揭发材料）。对个别同志的检讨有意见，个人可以答复。

整风是长期的，这里不能做到一下子解决，回去自己解决。

三、材料之一、三、四有什么意见，可以继续提。

四、基辛格今天来。我们开会的车辆，七点钟前进入大会堂，免得途中遇着，暴露会议。

下午看文件。

晚：七至十时，华北组继续开会，进行批判。东兴同志发言中说，平型关战役不要批了。打平型战役是不对的。但打胜了，中外也有一定影响，中央在事后也承认了，报纸也报道了，就不要批了，主要批辽沈战役过程中林彪的错误。

六月二十日

上午：读文件，边读边议，边看地图。

下午：修改简报。

晚：华北组继续开会，批林的军事路线。

林彪是一个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1、土地革命初期开小差，走投无路又返回了；
- 2、“红旗到底打多久？”；
- 3、“论短促突击”，推行王明消极防御路线；
- 4、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四渡赤水的战略计划和指挥；反对到川滇黔边寻求新的战机的英明决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阴谋夺毛主席的权；
- 5、抗拒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到陕南打游击去，分裂红军；
- 6、红军东征山西时，他反对在山西建立根据地，要毛主席回陕北去，再次企图夺毛主席的权；
- 7、反对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在恒山山脉、吕梁山脉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 8、1940年7月，在苏联发表反共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十分露骨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为最高统帅，根本不讲毛主席的领导，共产党的主张；
- 9、反对毛主席对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和正确指挥；
- 10、反对毛主席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的正确方针；
- 11、同高岗、彭德怀勾结，要夺毛主席的权。

六月二十一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修改简报，集体。

晚：华北组继续开会。先瑞同志传达，有的小组有的同志要求给时间，进行自我检查。由各组根据情况自定，可以讲，也可登简报，也可按计划进行批判。

先瑞讲林彪插手北京军区的情况。

六月二十二日

上午：小小组集体阅读了特字号简报二号（关于赵登澄、杨为林彪整中央老同志的严重罪行）。

下午：阅读简报。

晚：看“龙江颂”演出。

六月二十三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阅读简报。

晚：八时至十二时，全体会议。

总理主持开会，宣布今日结束会议。

一、乔冠华同志讲外交路线胜利；

二、总理讲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毛主席批示，“此事早已弄清了，完全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三、总理讲关于传达问题，口头传达到大军区常委、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省、军级党委常委。其他文件传达等中央通知。

新疆、西藏、贵州，留下谈谈。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天津市出席会议的四人议了回去传达的初步想法。会议开五至七天；解、吴、刘分别谈会议精神和主要内容；然后学文件，讨论。如何开法，提交常委议定。

下午：同蔡树梅同志到颐和园、西郊动物园游览。七、八年没有到这些地方了。

晚七时动身，九时半抵津。

注释：

注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注2，梁兴初：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因受林彪事件的牵连接受审查。

注3，谢家祥：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因林彪事件受到牵连。

注4，张西挺：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刘结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注5，“五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

注6，毛家湾：林彪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城区平安里东南。

注7，吴岱、刘政、蔡：吴岱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刘政时任66军军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蔡树梅（女）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注8，孟家楼：位于天津市蓟县，是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

注9，林程：林彪的胞弟林育菊，又名林程。1937年由林彪写信动员去延安抗大学习，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天津结核病医院任职。

注10，黄指黄永胜，吴指吴法宪。二师指驻天津的高炮二师，464医院指驻天津的空军医院。

注11，王、许、费三同志：王一，时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许诚，时任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费国柱，时任66军政委、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注12，郑三生：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注13，指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林彪发表于1940年7月的《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注14，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刘仁静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布了托陈取消派的纲领。

注15，陈先瑞：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注16，朱彪：时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7月号

~~~~~

## 【追根溯源】

### 彻底批判文革理论

#### • 车窗外 •

1976年底，肆虐华夏十年的文革运动随着“四人帮”退出政治舞台而结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接下来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从此民心顺、百业兴，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文革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中国由从一个缺衣少食的落后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民富国强的工业国。

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按理说中国人应该很幸福了，全国人民也应该更团结，精神面貌更好，道德更高尚，待人更宽容，民族素质更佳。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人道德反而在滑坡，斤斤计较得失的人相当普遍，埋怨声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怀念文革的思潮和话语。尽管那些叫嚷文革好的人没有几个愿意再回到那个岁月，但他们发出的声音在网络里却不小，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和危害文革以后出生的人。

十年文革运动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华国锋语），国家发展落后世界同类国家几十年。人民缺衣少食，社会上物质极度贫乏，中国进入了凭票购物的票证时代，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粮、油、布、付食品……）凭票定量供应，连一块水豆腐也要凭票（每人每月定量一斤，这还是城里人才享有的特权，农村人除了享有与城里人一样多的布票外，其它票证全无）。



文革造成了社会大动荡，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苦了中国人，用叶剑英的话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灾难罄竹难书，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怀念文革？部分原因是由于官员腐败、国民道德滑坡……等负面现象引起了无奈民众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而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文革结束后，为了维护安定团结、为了避免尊者忌讳，舆论上对独具文革特色的错误思想、理论没有进行很好的、有效的批评；对文革罪恶处理也是草草了事，才导致现在文革派的网站林立、文革特色帖子汗牛充栋，形成逐渐坐大之势，很大程度上已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倒逼人民反思文革。

要遏止文革思潮、文革语言泛滥成灾，必须要象当年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样，再来一次解放思想。讨论“文革理论”，绕不开领袖在文革时期理论上的错误，应该要直面以对，分清是否，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让人们知道文革理论的错误，认清错误理论导致的错误行动，错误行动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样才能使人们厌恶文革，防止文革派复旧回潮。

稍稍归纳一下，错误的文革理论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迷信崇拜领袖个人的理论。先是赞其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然后顺理成章地把领袖的话定义就是真理，而且“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任何一句话（那怕是一句拉家常的话）都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指示”，全国各级党政军机构，各族人民都必须要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而且不管是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样大力宣扬迷信崇拜个人，看似出于对领袖的极度热爱，实质上是把领袖捧上了神坛，捧成了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活菩萨，集九五之尊、宗教教主于一身，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人民自然也就成了最虔诚的教民。

在迷信崇拜个人盛行到无以复加的大潮里，领袖代表着神的意旨教育、指导全国人民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切。全国教民虔诚地为其唱赞歌，跳忠字舞。在任何集会、活动之前首先要背几条“最高指示”，连家书甚至社交对话也形成了先来一段最高指示的八股格式，造成一道古今中外仅有绝无的宗教奇观。

崇拜迷信个人捧就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怀疑的绝对正确，使其部署、行事必然地任意而为。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和意见，否则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这样的环境气候注定了十年“文革运动”成为十年浩劫。

崇拜迷信个人是文革灾难之源，文革结束后还在继续影响中国。要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不知要到哪个猴年马月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今天反省文革，同样也需要有真理标准讨论时的勇气，直面错误的文革理论，别再让文革理论祸害中国人了。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以这个理论为依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中国传承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彻底摧毁，代之以“阶级”划分敌友，判定是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所有法律、制度；科学、文化、艺术的唯一功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任用干部、招收工人、录取学生只能是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家庭出身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一切。

文革年月，“以阶级斗争为纲”遍及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角落落，融入到每个组织、每个人。从城市到农村、工厂到矿山、机关到野外、军队到学校、集体到个人，所有的行为、文化、标志、语言都离不开一个斗字。许许多多中国人被斗的家破人亡，人们的良心被斗没了，原始野性和警惕性被斗出来了，个个都瞪大着眼睛，时刻联系“阶级斗争”，警惕着身边的人和事。火烧、炮轰、打倒……这些火药味特浓的词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教民们神经质地狂热着，神经病般地扮演着魔鬼，不可思议地干着荒唐事，学生斗老师、儿女斗父母成家常便饭，不少人做出了让自己愧恨终身的事（如安征妇女方忠谋1979年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伟大领袖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枪毙。）

三，教育革命理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错误理论，让大、中专学校在文革初期连续三年停止招生后，实行了由基层的厂矿、公社大队推荐红五类上学的招生制度，美其名曰“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成绩已经不再是录取新生的标准，能升学的只能是红五类子女且有一定后台的人，智商高的优秀学生从此被排除在校门之外。这些工农兵学生大多数本来文化底子就薄，新学制又是以政治学习为主，在大学里几乎学不到多少文化知识，结果导致了中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人才断代，改革开放初期，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出现了极度匮乏的现象。

四，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理论。这个理论看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实际上只是鼓励造反派不管正确不正确，首先怀疑一切，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名人，然后“打倒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理论是掀起文革浪潮的杀手锏，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挥舞这个杀手锏，把开国功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学者教授一个个揪出来，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打倒了。

然而对文革运动和领袖，那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更妄谈否定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是对“造反有理”作明白的诠注，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就是右派翻天的下场。

五，走资派理论。文革运动冲击了大多数高官，并且要把他们罢官。但是，这些高官都是有功之臣，要把这些高官换下来，也就要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于是就给了他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衔，再派生出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配上“群众专政”的行动，无需任何程序手续，就可以对黑五类无端的斗争、批判、撒职，而且合理、合法，造成了席卷神州大地的血风腥雨

六，反“崇洋媚外”理论。以反对崇洋媚外之名实行闭关锁国，为了蔑视洋学术权威，还搞出了批判“相对论”的闹剧，贻笑大方。反“崇洋媚外”不但使科学、艺术……与世界脱节，更严重地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是中国人，不学abc，同样干革命”成为那个时期青少年的时髦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反“崇洋媚外”颇能迷惑人心，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一定市场，但历史大潮流是阻碍不了的。中华民族有与世界和谐共荣的优良传统，汉朝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是优秀的典范。文革结束后实行了开放，引进外国资金，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为中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

七，虚假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台湾的劳动人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中国人民要“为了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贡献力量。缺衣少食的中国人信以为真，尤其是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中国农民在这

些理论的说教下，心甘情愿、敲锣打鼓送爱国粮支援世界革命。国家开放后，人们才知道当年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比中国人生活好了不知多少倍。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发现越南人屯积的、原来都是中粮，而中国人自己在饿肚子。

八，大民主理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理论最具欺骗性，文革派至今仍大肆宣扬，津津乐道。

事实上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仅仅是用来武装造反派的。1967年1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严惩。规定了四大自由只能是为文革运动、为阶级斗争服务，如果偏离这个原则，就会受到严惩。所以，四大自由只成为对运动对象（黑五类）进行谩骂、造谣、揭隐私的工具。除此之外，不但没有自由，反而是因言获罪（冤假错案）的灾祸之源，。

九，破四旧的理论。文革破四旧的理论以消灭产生封资修的温床为理由，否定学习、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道德、传统。有史以来，人们都知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道理，旧是今日的昨天，今天又是明日的昨天，前人的思想、经验、道统、文化、习俗值的后人去借鉴，去伪存真、汰劣留精地继承，成为后人的财富。文革实行破四旧，把一直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道德文化说成了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祸害了中国几千年。把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国外引进的好东西统统作为封、资、修予以铲除。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论引导下，造反派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石碑、牌坊，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不许唱传统戏曲，焚烧戏装、道具仿古工艺品……将化妆品、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花发卡、女人留辫子、穿色泽鲜艳的花衣……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予以嘲讽和禁止。文革中被颠倒的黑白，由于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直到现在，文革派还把“破四旧”的理论还在网络中传布。

文革是中国现代一部极有教育意义的厚重的教科书，值得人尤其是没经过文革的人细细研读，读懂读透；文革理论更值得人们认清谬误之所在，从思想上铲除文革遗毒，才能保证文革运动不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